

November 2012

Zhu Guangqian and British Empiricist Tradition and his Revisions over Benedetto Croce

Lang J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Jin, Lang. 2012. "Zhu Guangqian and British Empiricist Tradition and his Revisions over Benedetto Cro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6): pp.61-6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6/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朱光潜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

——兼论 1930 - 1940 年代朱光潜修正克罗齐的背景与资源

金 浪

摘 要: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朱光潜美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提供了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的知识背景,而且也成为他修正克罗齐的重要资源。作为现代实验心理学之前身的经验联想主义对经验联结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形式派美学在审美、科学、道德之间的区分,这使得朱光潜可以重新思考文学与道德关系,弥补形式派美学片面强调审美独立性的缺陷。通过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与中国儒家礼乐精神相沟通,朱光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情的美学”,并将美学提升为一种政治方案。

关键词:朱光潜 克罗齐 经验主义 联想主义 情感 道德

作者简介:金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电子邮箱:jinlang447@163.com
本文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Title: Zhu Guangqian and British Empiricist Tradition and his Revisions over Benedetto Croce

Abstract: The British empiricist trad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s, which has become both the background for him to accept and the resource to revise Benedetto Croce. The study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ist school on how associations worked helped to bypass the distinction made by formalistic aesthetics betwee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science and morality, which also informed Zhu Guangqian's reflection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orality and led to Zhu's revision of the formalist aesthetics' overemphasis on the aesthetic autonomy. By integrating the British empiricist tradition with the spirit of *Li* and *Yue* in Chinese Confucian tradition, Zhu Guangqian constructed his unique aesthetic of emotion and promoted it as a political endeavor.

Key words: Zhu Guangqian Croce empiricism associationism emotion morality

Author: Jin Lang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Email: jinlang447@163.com

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吸收以克罗齐为线索,这几乎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但细作考察,这一共识其实源自朱光潜本人不断地自道:“我学美学是从学习克罗齐入手的,因为本世纪初期克罗齐是全欧洲公认的美学大师,我是在当时英美流行的风气之下开始学习美学的”(《朱光潜全集》1:648)。今天看来,克罗齐的影响固然不可否认,但过于强调对克罗齐的接受也可能会遗漏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朱光潜为何会“误读”克罗齐?这种“误读”是有意还是无意?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在持续地引发争议。^①在笔者看来,大多数人在关注前一句中的克罗齐之同时,却往往遗漏了后一句中的“英美流行之风气”。这意味着,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接受还存在着一个前提,那便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它不仅决定了克罗齐上世纪20年代在英美流行的方式,也决定了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接受

方式。然而,相比于对克罗齐的不断“误读”与重述,朱光潜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直接论述却相当有限,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美学史》中才辟了专章进行论述。这种“回避”使得今天对此线索的清理充满难度,本文即试图从三个方面来简要阐述朱光潜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关系。

一、经验与联想:心理学的英国传统

心理学是朱光潜接受英国经验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年轻时的朱光潜对心理学一度兴趣浓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兴趣第一是文学,第二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而美学把这些兴趣统合在了一起。他的好友、后成

为著名心理学家的高觉敷也回忆说:“记得他赴英国留学的第一年,还常写信来说自己很犹豫,究竟舍心理学而专研文学呢?或竟舍文学而专研心理学呢?”(193)。早在求学香港大学期间,朱光潜就接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并写下了最初的几篇心理学论文。到英国之后,这种兴趣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在爱丁堡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心理学的研究班,并在心理学导师竺来佛的指导下,写出了论文《论悲剧的美感》。这篇论文成为他后来博士论文的雏形。从爱丁堡毕业后,朱光潜又跨海到法国巴黎大学去旁听德拉库瓦教授的文艺心理学课程,并最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论文的指导老师夏尔·布朗达尔同样是心理学教授。即便从专业角度而言,朱光潜在心理学上的造诣也绝非业余爱好,以至于高觉敷评价道:“他在心理学上的贡献,实超过于一般‘像煞有介事’的专门家之上”(193)。这并非溢美之词。朱光潜不仅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弗洛伊德、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完形派心理学,而且还试图将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相结合,其早年著作《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均以心理学命名,由此可见一斑。

在《文艺心理学》一书的序言中,朱光潜还特别解释了“心理学”命名的由来:“我对于它的名称,曾费一番踌躇。它可以叫做《美学》,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通常都属于美学范围。美学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与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做《文艺心理学》。这两个名称在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也并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朱光潜全集》1:197)。由此可见,朱光潜对其美学的心理学方法不仅是自觉的,而且还刻意以此显示出与传统哲学美学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后来朱光潜在回应沙巴蒂尼批评他错误地用经验主义去解读克罗齐的思辨哲学时,表述得更加清楚:“朱光潜把他的著作称为‘文艺心理学’,就标明了他的出发点是经验科学而不是思辨哲学”(《朱光潜全集》10:552)。

不可否认,正是对心理学的这种笃好构成了其研究和接受克罗齐的基础。有研究者即指出:“在他的美学中,他总是试图以经验心理学成果来阐释克罗齐的理性主义论点,他的心理学知识始终是其美学构成的重要因素”(王攸欣 127)。然而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心理学并不等同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准确地讲,朱光潜早期所受到的经验心理学影响更多来自于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心理学。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

学实验室被认为是科学心理学之诞生的标志,到了朱光潜留学英法的20世纪20年代,西方心理学界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时代,构造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完型心理学等几乎同时并存,而以实验来研究审美心理正是当时流行的风气。对此朱光潜专门撰写了《近代实验美学》一文进行介绍。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英国经验主义指的则是由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所开创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感觉经验,知识是心通过感性经验的逐渐积累而发展的,这与理性主义者把知识来源视作天赋观念截然不同。在对经验积累的研究中,英国经验主义强调联结(association,又译联想)的作用,这一思路后来通过哈特利、布朗、穆勒父子、贝恩等人发展出了联想主义心理学,并成为现代心理学的渊数之一。

虽然朱光潜在哲学美学与心理学美学之间做了区分,但在现代心理学诞生之前,哲学与心理学之间并不存在界限,心理学往往被视作某种心灵哲学来研究(里德3)。这意味着现代实验心理学除了科学起源外,还存在着哲学上的起源,而在众多的哲学起源中,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又占据着重要位置。心理学史家波林便指出:“这个传统对于近代心理学的影响较任何其他传统为更大,他对德国的意动心理学、英国的系统心理学和美国的詹姆斯士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祖先。单靠生理学也许只能产生一种感觉生理学或反射学。英国的传统乃是实验心理学的必要的补充。它先提供了心理学的问题,规定了心理学的范围,使它超出了心理学的方法所能单独研究的范围。它虽然有时为心理学章目提供思辨的内容,使实验法束手无策,因而不能建立在实验资料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它也刺激心理学努力扩大实验室的技术以研究‘较高级的心理历程’。正是英国的传统使知觉成为心理学的主要问题”(190)。这段话精炼地阐明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对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意义。对此朱光潜同样有着清醒认识,他在后来的《西方美学史》中即指出:“首先是从英国经验主义盛行之后心理学日渐成为美学的主要支柱,休谟和博克都主要是从心理学观点去研究美学问题的。德国哲学家、‘美学始祖’鲍姆嘉通本人以及以研究形象思维著名的维柯,多少都是继承英国经验主义的衣钵”(《朱光潜全集》6:21)。

在很大程度上,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批判乃是通过从实验心理学向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回溯来实现的。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朱光潜写道:“从前,我受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欣赏一个孤立绝象的意象,不旁牵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觉察人生是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美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朱光潜全

集》1:197-98)。这段话常被摘引作为朱光潜自觉批判克罗齐的证据,却很少有人注意其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关联。正是从经验主义把经验视作感觉与观念之联结的视野来看,审美经验与科学思维、道德情感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异,因而也没法进行分割。这与康德区分知情意的思路截然不同,如果说康德对认识活动的规定立足于先天形式的话,那么,英国经验主义对意识联结的探询更近于对内容的关注,而正是这一对经验内容的关注打破了康德美学的划分。由此,朱光潜声称:“我们否认艺术的活动可以计入美感经验的狭窄范围里去,承认艺术与直觉联想仍有相当的关系,反对把‘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与‘科学的人’分割开来,主张艺术的‘独立自主’是有限制的,这都是与克罗奇背道而驰的”(《朱光潜全集》1:359)。

二、道德效果:重建美感的价值之维

朱光潜既然反对在伦理活动与美感活动之间强作区分,那么他对美感经验的论述就必然会触及道德问题,这同样显示出来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实际上,早年作为审美独立主义者的朱光潜拒绝承认审美与道德有关,直到他对形式派美学做出批评之后,其对待道德的态度才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向《文艺心理学》中添加的专论美感与道德的第七、八两章之中。在这补充的两章里,朱光潜分别从历史梳理与理论建设两个方面来论述了美感与道德的关系。朱光潜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道德教化历来就是文艺的重要功能,二者的关系直到晚近才受到来自两种力量的挑战:其一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其二则是从康德到克罗齐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美学,其中后者的冲击尤大:“这派美学从美感经验的分析证明艺术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活动。道德是实用的,起于意志;美感经验是直觉的,不涉意志欲念的。象游戏一样,它是剩余精力的自由流露,是‘无所为而为之的观赏’,所以与道德实用无关”(《朱光潜全集》1:303)。此种思潮的反面,朱光潜则以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英国的 I. A. 瑞恰兹(也附带提及批评家罗斯金和莫里斯)为例来加以论证。朱光潜认为二者均提供了将道德与美感相关联的解释,但差别在于前者受太多宗教影响,后者更具科学意味。相较之下,朱光潜自然更倾向于瑞恰兹。

朱光潜对瑞恰兹的青睐同样与已跻身科学行列的心理学有密切关系。1925 年朱光潜赴英伦留学之时,正逢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的出版。该书将心理学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尝试,使得瑞恰兹成为当时英国炙手可热的批评家。朱光潜是否在英国期间阅读了瑞恰兹,已难考证,但至少在 30 年代中期批评克罗齐的时候(其时瑞恰兹在清华大学任教),瑞恰兹已成为屡被引用的人物,并在他

批判克罗齐的转变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文艺心理学》后来补入的专论克罗齐的章节中,朱光潜对克罗齐提出了三大批评:“第一是他的机械观,第二是他的关于‘传达’的解释,第三是他的价值论”(《朱光潜全集》1:359)。其中直接作为该章副标题的“传达与价值问题”成为了朱光潜批判克罗齐的重要立足点,而这两点均可由瑞恰兹的理论所提供。很少有人留意到,该书附录参考书目在传达与价值条目下所列的便是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瑞恰兹在该书里指出:“批评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两大支柱便是价值的叙述和交流的叙述”(19),虽然托尔斯泰的文论亦可提供同类观点,但朱光潜只单列瑞恰兹的著作即足见其取舍。相较托尔斯泰的俄国式的宗教情结,瑞恰兹则显示出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②其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便是一个体现。

瑞恰兹对价值的强调主要是针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而发。由于深受欧陆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对知情意先验划分的影响,英国唯美主义者认为以形式为皈依的美感经验具有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就将价值问题排除在了美感之外。然而瑞恰兹认为这种先验假设很难被心理学所证实,因而呼吁研究美感必须回到对具体经验的分析上来。在遵照英国经验主义的理论假定之基础上,瑞恰兹指出,作为感觉与反省之产物的审美经验与其他经验并无不同,“它们仅仅是进一步发展且更加精细地组织了普通经验,而根本不是一种新型的不同的种类。我们赏画读诗或者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做什么特别的事,跟我们前往国家美术馆途中的言谈举止或清晨我们穿戴衣冠的情形并无两样”(10)。

事实上,对美感与道德的这种“不做区分”早已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共识。洛克宣称人类所能证实的惟有经验,在此基础上,“事物有善恶之分,只是因为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199)。哈奇森亦认为:“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道德感,比起别的感觉来,更需假定的任何天赋的观念、知识、或实践命题。我们所谓道德感,只不过是心灵在观察行为时,在我们判断该行为对我们自己为得为失之前,先具有的一种对行为采取可爱与不可爱意见的作用”(转引自周辅成 790)。这就将道德与审美直接关联,而其《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更是将二者合而并论。与之类似,休谟也以为:“道德不在事物的抽象性之中,而是完全与每一特定存在的情感或内心情趣相关;其方式与甜和苦、热和冷的区分由各个感官的感觉中产出来一样。因此,道德知觉不应归类于理智的活动,而应归类于趣味或情感”(转引自周晓亮 246)。由于把道德的基础放置到经验活动当中,并被归结为快乐与痛苦的效果,那么,道德不仅与审美没有区别,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审美的。

然而,瑞恰兹又小心翼翼地避免将道德与美感直接划等号,其论述美感与道德关系时之所以采用“价值”的说法而非“道德”或“伦理”,即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瑞恰兹看来,不恰当地引入价值考虑通常会导致失败,托尔斯泰即这样的例子(朱光潜亦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对托尔斯泰颇有微词)。为了摒弃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瑞恰兹转而采用心理学上的冲动满足理论来重新对价值进行解释:“最有价值的心态因此就是它们带来各种活动最广泛最全面的协调,引起最低程度的削减、匮乏、冲突和限制。大体而言,心态的价值程度在于它们有助于减少浪费和挫伤”(50)。因此,凡是能够调和人类各种冲动满足的东西便有价值,这就将道德规范问题转化为了冲动组织的问题。就此而言,瑞恰兹的理论多少显示出整合英国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尝试。在瑞恰兹看来,文学艺术的意义即在于它们能够促进这种调和,并最终使得“我们支配生活的能力、我们观察生活的眼光、我们对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辨别力都有所提高”(215)。这一态度恰为朱光潜所取。

在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历史作了梳理后,朱光潜也试图阐明自己的观点。按照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朱光潜首先把作品分为三类:一是有道德目的者,二是一般人所认为不道德者,三是有道德影响者。第一类利用文艺来进行道德宣教,第二类虽然在主题上与一般人的道德观点相违,却也存在不少艺术佳作,第三类指的则是那些能在气质或思想方面对读者产生良好影响的作品,因此朱光潜得出结论说:“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朱光潜全集》1:319)。不难发现,朱光潜同瑞恰兹一样,都认为文艺之于道德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通过经验的转换:“这种启发对于道德有什么影响呢?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切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朱光潜全集》1:325)。这种说法几乎就是对瑞恰兹文艺促进人生说的翻版。有论者据此指责朱光潜“混淆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薛雯 68),其实是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不了解的缘故。朱光潜并非混淆了文艺与道德,而是试图通过区分目的与效果来兼顾文艺与道德,即一方面承认形式派美学在美感经验中的部分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去论证道德价值在美感经验发生之前或结束之后的意义。当然,朱光潜的这种“兼顾”确实又陷入了他自嘲的“折中态度”。

三、情的美学:中西经验传统之互通

朱光潜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还体现在对美学情感功能的重视,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对克罗齐直觉论的接受。在1927年的《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克罗齐》一文中,朱光潜即启用了情感来解释克罗齐的直觉概

念:“在心灵的创造作用中,背面的支配力是情感。所以克罗齐又把‘美术即直觉’一个定义引申为‘美术即抒情的直觉’。换句话说,在美术的直觉中情感与意境相融合为一体,这种融合就是所谓‘心灵综合’,所谓‘创造’,所谓‘表现’,总而言之,就是美术”(《朱光潜全集》8:236)。有论者指出这是对克罗齐理论的重大误解:“其实‘情感’在克罗齐看来只不过是被动的‘材质’,绝不是支配力,这种误解直到40年代才消除”(王攸欣 128)。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在写于1947年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中,朱光潜即对他用情感来解读克罗齐直觉概念的根源作了交待:“因此我颇疑心他利用feeling字义的暧昧,把他自认为尚未成‘觉’的‘感触’(feeling)和一般人随便称为feeling的深切‘觉’得的‘情绪’(emotions)混为一事”(《朱光潜全集》4:382)。然而,对知识上的“误解”的澄清并不意味着主观态度上的“误读”的消除。

事实上,在指出自己“误读”根源的同时,朱光潜也为用自己用情感解释克罗齐直觉概念的思路做了积极申辩:“由感触到直觉(由一片绿叶的刺激生成绿叶形状的知觉),只经过一步活动;由情绪到表现(由感觉到欢爱的情绪到用‘关关雎鸠’那意象表现它),却须经过两步活动,首先觉到情绪,其次知觉到表现那情趣的意象”(《朱光潜全集》4:382-83)。而克罗齐的问题即在于混淆了一般性知觉和艺术直觉,前者仅仅是“感触”,后者才是涉及到“情感”,二者正是非艺术与艺术的区别。可见,朱光潜认为“误读”的根源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于“克罗齐似根本没有认清这个分别”(《朱光潜全集》4:383)。在朱光潜看来,尽管自己“误读”了克罗齐,却远比克罗齐更正确。实际上,通过对自己的情感概念与克罗齐混淆“情感”与“感触”的feeling之间做出区分,朱光潜不仅没有消除“误读”,反而阐明了自己“误读”的合理性。而隐藏在这种对“误读”之坚持背后的,其实正是朱光潜独特的“情的美学”。整体而言,朱光潜用情感来解释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存在着两大思想渊源。

其一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情感(emotion)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命题,涉及人的行为实践与道德判断。夏夫茨伯利划分了情感的不同类型,并认为“按照这些情感的存在,一个人可分为道德的或邪恶的,善的或恶的”(转引自周辅成 766)。而哈奇森和休谟也同样认为道德并非理性判断,而是源自于情感。对此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评论道:“休谟所提的同情说着重美的社会性和道德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健康的观点。他有力地打击了形式美的传统观点”(《朱光潜全集》6:256)。其实这种对社会性和道德性的强调恰好也是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批判克罗齐的立足点:“照克罗齐说,艺术家都是自言自语者,没有把自己的意境传达给别人的念头,因为同情、名利等等都是艺术以外的东西。这固然有一部分真理,但却不是全部真理。艺术家同时也是一种

社会的动物,他有意无意间总不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朱光潜全集》1:364)。虽然都存在对社会性的强调,但与康德哲学所预设的共通感不同,英国经验主义则诉诸于经验上可触可感的“同情”。

其二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抒情言志说发端于《论语》、《礼记·乐论》、《毛诗序》等儒家典籍。在这些儒家典籍中,情一方面是个性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性的,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与《文艺心理学》同时期写就的《谈美》中,朱光潜便试图将西方美学的移情论与中国传统诗学嫁接到一起:“总之,艺术的任务是在创造意象,但是这种意象必定是情感饱和的。情感或出于己,或出于人,诗人对于出于己者须跳出来观察,对于出于人者须钻进去体验。情感最易感通,所以‘诗可以群’”(《朱光潜全集》2:71)。虽然朱光潜“情之美学”的构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迫扭转了方向,却在京派文人圈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后来由陈世骧所接续,并传播到海外,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了对港台学术界影响甚大的“抒情传统”说(陈国球 68)。

上述中西传统对于情的理解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同样也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其实也就是伊格尔顿称之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东西。通过追溯 18 世纪美学的兴起,朱光潜发现审美领域乃是作为资产阶级理性统治对人的感性领域之拓殖而出现的:“美学乃是道德意识通过情感和理智以达到重新表现自发的社会实践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伊格尔顿 29)。这一过程在具有成熟市民社会的英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相比于理性,情感提供了更加牢固的社会基础。爱德蒙·伯克就曾指出:“风俗比法律重要。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风俗。法律只对我们产生局部和偶尔的影响。风俗既折磨又抚慰我们,腐化或纯洁我们,褒扬或贬损我们,使我们野蛮或使我们高尚[……]风俗把自身全部的形式和色彩都赋予我们的生活”(转引自 伊格尔顿 32)。无独有偶,这种通过情感所起到的移风易俗作用同样是中国传统诗学的要义,所谓观乐说、采风说的基础都在于认为诗歌中的情感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风俗状况,而圣人制礼作乐也是以情感来施行教化。

抗战时期朱光潜转向儒家礼乐精神正是在上述两大传统关于情之政治功能的互通中实现的。朱光潜 1941 - 1942 年发表的《政与教》、《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两文乃是这种互通的集中体现。在《政与教》中,朱光潜把政教关系视作历史兴衰的关键所在:“政与教并行,相得益彰,盖为社会安宁与文化进展之首要条件;政教脱节,政以其权乱教,或教不能以其潜力导政,则文化衰落与社会紊乱为必然之结果”(《朱光潜全集》9:91)。然而,由于政教合一的状态已无法实现,就只能求助于最佳替代性方案,即

“以教辅政”:“吾所谓以教辅政者乃中西大哲人之不谋而合之最高理想。孔子之全部政治哲学,细心玩之,实在于以教化为政治之基,以圣者为国家之元首”(《朱光潜全集》9:92)。而儒家教化的核心又在于“礼”与“乐”:“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从伦理学的观点说具有和与序为仁义;从教育学的观点说,礼乐的修养最易使人具有和与序;从政治学的观点说,国的治乱视有无和与序,礼乐是治国的最好工具。人所以具有和与序,因为宇宙具有和与序。在天为本来,在人为当然”(《朱光潜全集》9:111)。

可见,“礼”与“乐”在朱光潜眼中并非是通常所谓的“繁文缛节”或者“吟风弄月”,而是关乎人类社会中如何才能实现“和”与“序”的大问题。然而与现代新儒家们不同,朱光潜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乃是通过美学视野呈现出来的。如果说此前朱光潜对美学政治性的关注还潜藏在他对克罗齐美学的“误读”与批判外衣下,那么在朱光潜抗战时期关于政教礼乐的讨论中,美学的政治性则被直接暴露到了前台。从这个角度回溯朱光潜 1930 - 1940 年代接受并修正克罗齐美学的曲折道路,不难发现,朱光潜此前以情感来解释克罗齐直觉概念的思路并非局限于美学知识的内部讨论,而是要为美学的政治功能铺平道路,并最终在关于“礼”与“乐”的讨论中,将其提升为一种政治方案。正是在这种与现实问题的关联中,发源于西方的美学才不只是一种舶来学问,而是切切实实地成为中国现实的一部分。

结 语

本文钩沉朱光潜美学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关联并非意在推翻旧说,而是试图指出,无论是对于理解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接受,还是对于理解朱光潜自己的美学构建,英国经验主义的视野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朱光潜自称受康德 - 克罗齐一线的形式派美学影响最深,甚至还在批评冯友兰时把经验主义称为“浅薄的”(《朱光潜全集》9:49),但这些均不能否认他曾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从对克罗齐的“误读”到对“误读”的坚持,再到抗战时期对中国儒家政教礼乐精神的表彰与“情之美学”的构建,“英美风气”都是深藏其后的背景与资源。虽然朱光潜对英国经验主义的吸收多少显示出无意识的特点,但正如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无意识时常发挥着比意识远为强大的力量。

注释[Notes]

①其中王攸欣与肖鹰就朱光潜接受克罗齐问题产生的争论堪为典型。参见肖鹰:“怎样批评朱光潜?——评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文艺研究》5(2003):132 -

37;王攸欣:“怎样研究朱光潜?——答肖鹰对我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的批评”,《文艺研究》1(2004):129-33。
②对瑞恰兹的研究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他与英国经验主义之间的关联,可参见 Law, Jules David. *The Rhetoric of Empiricism: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from Locke to I. A. Richard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Craig, Cairns. “T. S. Eliot, I. A. Richards and Empiricism’s Art of Memory.”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No. 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111-3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G·布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Pauline, E. G..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rans. Gao Juef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现代中文学刊》3.3(2009):64-74。
[Chen, Guoqiu. “Before ‘the Lyrical Tradition’: Chen Shixiang and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3.3 (2009): 64-74.]
高觉敷:“《变态心理学》序”,《朱光潜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Gao, Juefu. “Preface to *Abnormal Psychology*.”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Guangqian*. Vol. 1.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87.]
爱德华·S·里德:《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李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Reed, Edward S.. *From Soul to Mind: the Emergence of Psychology from Erasmus Darwin to William James*. Trans. Li L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卷,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Vol. I. Trans. Guan Weny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
[Richards, I. A..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Yang Ziwu.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ry and Art Press, 1992.]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Wang, Youxin. *Choice, Acceptance and Distanci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ang Guowei’s Accepting Schopenhauer’s Aesthetics and Zhu Guangqian’s Accepting Croce’s Aesthetic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薛雯:“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8.5(2004):63-68。
[Xue, Wen. “Zhu Guangqian’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orality.”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ctions) 28.5 (2004): 63-68.]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Trans. Wang Jie,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Zhou, Fucheng, ed.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Ethics*. Vol 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4.]
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Zhou, Xiaoliang. *Hume and H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6.]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Zhu, Guangq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Guangqian*.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87.]

(责任编辑:王 峰)